

杨明伟
著

从“大跃进”到国民经济调整

内忧外患，步履艰难

一个共和国极为严重的困难时期在等待着他……

走出困境

周恩来在1960—1965

杨明伟
著

走出困境

周恩来在1960—19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困境：周恩来在 1960—1965 / 杨明伟著. —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203-10385-1

I. ①走… II. ①杨… III. ①周恩来(1898-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9426 号

走出困境：周恩来在 1960—1965

著 者：杨明伟
责任编辑：吕绘元
复 审：贺 权
终 审：阎卫斌
装帧设计：今亮后声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0351-4922159
E-mail：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27.25
字 数：445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18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10385-1
定 价：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导 语 / 001

前奏 一波三折的建设，思路有别的探索 / 003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第一章 从化读书，静下心来思考建设问题 / 028

他告诫说：“总不能天天跃进，总有波浪。”发表这样一番讲话，在当时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周恩来的这番理论勇气，自然得益于深入研读马列著作和从化读书生活的静心思考。1960年二三月间，留下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难得的一份二十多天的读书记录。

第二章 出台八字方针，正式进入调整时期 / 048

“高指标几年了，这次允许我们试一次低指标。如果低错了，我们承认错误就是了。明年减低速度，这绝不是什么消极的措施。这是为了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后，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有更大的改进，是我们主动搞的有计划的马鞍形。”

第三章 调整拉开序幕，先下去搞农村调查 / 063

“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第四章 同邻国第一个解决边界问题 / 084

“必须解决得是公道的、合理的，能够给人家一个范例，就是中国现在解决边界问题是合理的，使大家放心，能够和平共处。这是一个现实的态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处理我们国家的边界问题。方法上只能经过谈判，不能采取别的办法，军事紧张应该把它消除。”

第五章 新侨会议树自己为“活靶子” / 109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

第六章 七千人大会，亦喜亦忧 / 123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像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账，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

第七章 非常时期东北行 / 145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是拿自然规律来解释的。拿社会规律解释也是一样：胜利了的、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在世界上，在今天的时代，应当担当大任。则‘必先苦其心志’，就是要一个人经受各种锻炼，思想、意志必须得到锻炼。……经过这些锻炼，把我们锻炼得有涵养了，不那么急躁了，也能够忍受了，既克服了困难，也增强了自己的本领。”

第八章 对话班禅的“七万言书” / 173

班禅写的“七万言书”，报告名上唯一出现了周恩来的名字。仔细看了“七万言书”后，周恩来评价：“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并说：“看法有出入，是思想问题。”

第九章 经济调整与阶级斗争两条线 / 192

“在调整时期，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比如，对于形势的认识，在五月会议的时候，把困难说多了一些，说过了一点，这对干部起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那个时候，工作的方向还是鼓足干劲，同困难作斗争，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第十章 主持调查巨轮沉没事件 / 209

“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当政委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如果我们对官僚主义不提足够的注意，不论干部，不论群众，都会慢慢地蜕化下去。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就是革命的意志衰退。”

第十一章 首访非洲，十万八千里探路 / 228

“前后共经历了 72 天，行程十万八千里。我们这一次去访问，可以说是走马观花，去做探路的工作。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影响会跟着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发展。”

第十二章 亲自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 277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厚今薄古’，要成为我们文艺工作的座右铭，成为我们的方针。中国的艺术必定要以六万万五千万人为出发点……以他们的喜闻乐见为主要方面。”文艺工作者感叹：“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

第十三章 统帅尖端科技，先抓原子弹 / 303

“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在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地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消极方面来说，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

第十四章 最后一次访问苏联 / 331

“我们这次来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会为今后打下一个好的开端。我已经有三年没有来了。”苏联新领导人辩称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酒后失言”。周恩来一语道破天机：他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层中仍有人继续搞赫鲁晓夫那一套。

第十五章 率中国民航专机飞出国门 / 350

专机顺利地跨越喀喇昆仑山，在朝阳的照耀下冲出了国门。为了活跃气氛，减轻机组人员的心理压力，周恩来起了个头，领着全机人员引吭高歌《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第十六章 安排李宗仁叶落归根 / 365

“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相见以诚，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欢迎李宗仁在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周恩来告诫试图介入中美关系的李宗仁：“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对分裂中国的谬论，周恩来断然表示：“绝无商量的余地。”“如果台湾当局觉悟了，下了决心，只要发表一份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我们一定立即维护和支持他们。”

第十七章 主持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 / 388

“我们的经验，国民经济的安排，农轻重的顺序不是偏废的一面，要同时搞。但重点是农业，其次是轻工业，有原料也要搞重工业。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搞得不错，经济上也有一定的力量，但有一个弱点，农业没有搞好。”“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

后 记 / 424

导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自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后，便跨进了一个特殊的时期。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在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它的前半段和后半段给后人留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前半段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纠正冒进及“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是下大力气搞经济建设，抓国民经济调整的时期；而后半段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左”的错误再次不断膨胀，进入了以“文化大革命”为名的全面内乱时期。历史的复杂性，给人留下了许多疑惑。

然而，历史的演变，并不是全然无章可循的，它的每一个时期或阶段，都有其自身起承转合的内在逻辑。

当我深入、细致地去研读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历史时，目光一下子被锁定在它的前半段——1961 年至 1965 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人们称它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它既处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特殊阶段。这段特殊的时期，既高奏凯歌又充满艰辛，给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群众提供的，都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舞台。

梳理这个舞台上唱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头戏”的人物，周恩来，显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角”。

让我们翻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来看看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部分结论：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们国民经济在 1959 年到 1961 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960 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 1962 年到 1966 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

《历史决议》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是一条顺境与逆境并存、成就与挫折同在、主线与副线纠缠、清醒与困惑交织的不平坦的道路。

对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而言，在这条不平坦的道路上，他勇于担当、披荆斩棘、鞠躬尽瘁，坚定地践行着早年立下的“为了中华之崛起”的誓言；在这条曲折发展的道路上，他疲于奔忙、殚精竭虑、化险为夷，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充满信心地引领党和国家走出困境。

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决议》的上述结论、进入这段历史，也进入周恩来的世界，让我们首先从倾听它的“前奏曲”开始……

前奏

一波三折的建设，思路有别的探索

要搞清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历史为何风云变幻，仅仅看它本身的一些篇章是不够的。会找门道的人，总要先去摸摸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

在中共中央《历史决议》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話：

在 1955 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1956 年 9 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坚持了 1956 年 5 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历史决议》中的这段话，还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在 1956 年前后，由于冒进与反冒进的不同做法，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出现了两种思路。最终，大冒进战胜了反冒进。所以《历史决议》中还说了这样的话：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

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955年秋季以后，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在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对中国建设速度的一种着急。他试图打破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对毛泽东的提法，周恩来最初也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在高指标上来以后，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

自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年，人们在正常而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对社会发展产生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领导层。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7月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却不仅仅是农业问题。

这份决议的一些提法，让人闻到了尖锐批评的味道：

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到极大的困难。

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

这种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的做法，无疑将助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党的主要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

1955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他设想，到1956年，既可“达到80%到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后，又“可以迅速发展农业”，“在其初建的一两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至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七八年后可以增产1倍”。

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领导建设工作的一个主要战略意图。

在他的讲话中，表露了对党内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建设速度缓慢的一种着急。他说：

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定全面规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想法。他认为，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而是要不断地批判在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经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多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

合等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毛泽东认定：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的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趋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与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起来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联系的，也是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相关联的。当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并不是他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党中央的共同认识。最初，周恩来等人也是同意这种认识的。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确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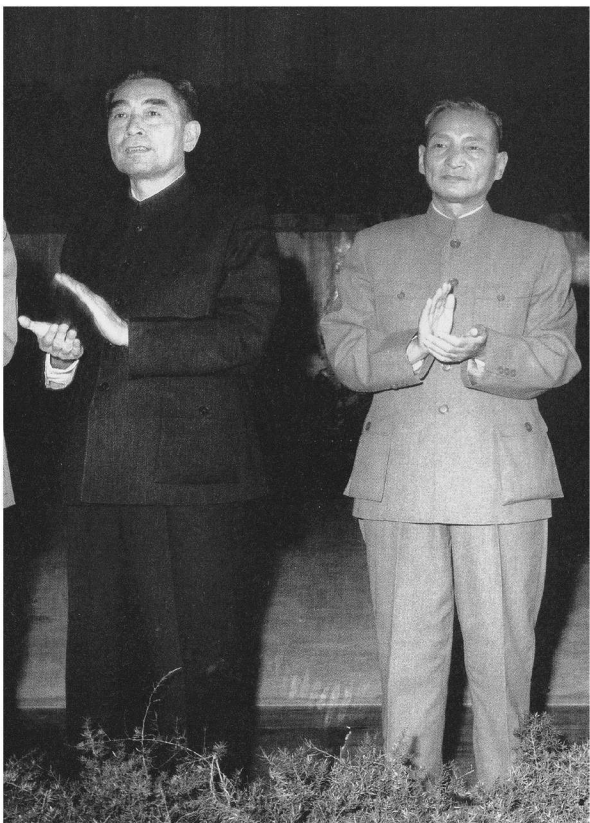
人们是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情绪中进入 1956 年的，从这年 1 月开始，中国人民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956 年 1 月 1 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在 1953 年所规定的过渡时期总任务都将被提早完成。社论预言：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只要到 1956 年秋天，我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在那时以后的不多几年，基本上实现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

社论用“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类豪迈的语言，来赞扬全国人民急于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

当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四十条》）。《农业四十条》要求，到 1967 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 1955 年的预计数 3652 亿斤、3007 万担增加到 10000 亿斤、10000 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 8.8%、10.5% 的速度递增。

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12 年内是无法实现这些高指标的。



周恩来和陈云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 1955 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这股风一吹，1955 年 9 月 22 日中央各部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被不断加码。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非常不尽如人意。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周恩来和陈云是党内较早地察觉到急躁冒进倾向的领导人，他们预感到，

一个盲目冒进的局面正在形成。

在党内，逐渐形成了“促进”和“促退”的两种思路。

周恩来的风格，是既反右倾保守，又反盲目冒进。这种风格在国务院工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1956年2月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他给与会者一个强烈的感觉——经济工作必须实事求是。

会上，周恩来以稳妥的想法给国务院组成人员解释了毛泽东的提法：

毛主席说：“大约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都可能拖长一些。

他进一步告诫大家：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他接着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条件”的重要性：

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儿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

苦口婆心地劝说之后，他针对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发热，狠狠地说了几句话：



1956年，周恩来在杭州传达《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精神

各部门定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周恩来等人的冷静思考以及用“冷水”给“头脑发热”的领导人“洗头”的做法，应该说是符合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和辩证思考精神的；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未必完全同意这样做。

1956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听取李富春汇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的设想时，多次就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建设和行政开支与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问题讲话。

应该说，毛泽东一方面处在一种“促进”的思路下，一方面也关注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